

# 供需循环实现稳就业的双重保障效应分析<sup>\*</sup>

侯俊军 岳有福 叶家柏 孙克娟

**内容提要:**就业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本文从新发展格局“经济循环”的内涵出发,基于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测度了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了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国基本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兼有国内国际循环联动的双循环就业增长模式,国内循环是实现稳就业的主体,这一特征在供给循环和需求循环中均表现出稳健性。供给循环效应和需求循环效应两者抵消了就业强度效应对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共同保证了中国就业的平稳增长。分解结果表明,实现“稳就业”的关键在于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其中,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和国内对内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效应是国内循环发挥“稳就业”作用的主要原因。相比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更为“稳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逐渐成为驱动中国就业增长新的动力源和稳定就业新的潜力源。本文丰富了双循环经济效应的研究,并为政府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供给循环 需求循环 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 结构分解分析 就业稳定

**作者简介:**侯俊军,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湖南工商大学副校长,410079;

岳有福(通讯作者),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410079;

叶家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项目研究助理,100084;

孙克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450046。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4)05-0142-17

## 一、引言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双循环”概念,随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标准治理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研究”(17ZDA099);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研究”(23ZDAJ004)。作者团队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岳有福电子邮箱:yofuyue@126.com。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部署。学术界、政策界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解读(黄群慧,2021;江小涓、孟丽君,2021;李帮喜等,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习近平,2021)。在促进经济循环的过程中,作为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纽带,就业的稳定增长是经济循环高效畅通的重要保障。202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为此,准确衡量中国经济循环的就业效应,对比分析内外循环及其演变趋势,对实现“稳就业”目标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理解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循环的就业效应,首先需要准确识别和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一些学者以最终需求为落脚点,将国内循环理解为“内需”、国内国际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陈全润等,2022),并以此为基础测算了中国内外循环的就业效应(张俊荣等,2022;牛猛等,2023)。实际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循环”,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侯俊军等,2023)。“经济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词,是理解和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点,与此同时,经济循环也对“稳就业”目标实现产生诸多影响。而经济循环本质体现的是供需对接,循环中起始点(也是落脚点)可从生产供给出发,也可从消费需求出发(黄群慧、倪红福,2021)。从国民经济构成与循环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源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刘志彪、凌永辉,2021),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坚持供给侧改革的主线下协同强化需求侧管理(黄群慧,2021;黄群慧、陈创练,2021),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因此在考虑双循环的时候需要考虑双循环的供需特征。更重要的是,生产的要义在于适应或释放市场需求,并创造就业岗位(潘英丽,2022)。就业作为供给和需求的连接点(赖德胜,2021),不仅是一个供给侧变量也是一个需求侧变量,是企业间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循环以及对企业最终品需求循环的结果。

新发展格局是微观经济循环与宏观经济循环的统一(逢锦聚,2020)。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企业间的中间产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在畅通经济循环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侯俊军等,2023),也对通过稳定市场主体来实现“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从生产供给看,企业处于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s, NVC)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生产体系中(苏丹妮等,2020),企业间的循环关系体现在企业间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价值链关系之上,进而对一国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一个国家融入GVC的过程也是GVC向一国内部不断延伸的过程(潘文卿、李跟强,2018),直接表现为中间产品在国内外不同企业间进行循环流转。伴随着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国内同一类型、不同类型企业间以及国内外企业间的中间产品供给循环使价值链变得有“黏性”(Antràs, 2020),这种企业间循环对拉动一国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Hou等(2023)发现,由于对内资企业的外溢性影响,外资企业通过与本土内资企业间的循环互动平均每年拉动了中国内资企业2415.47万人的就业岗位。从消费需求看,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需求循环尤其是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体现了“对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种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所引致消费的劳动投入诱发能力最强(葛阳琴、谢建国,2019),支撑了大多数行业的就业增长。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消费者对国内不同类型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日益增长,成为拉动中国就业增长的主引擎。与此同时,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企业以及国外消费者对国内企业的最终品需求也在增加,让国内国际循环日益活跃,进而影响国内就业增长。特别地,国外消费者对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通过产业链传导影响国内的生产循环(侯俊军等,2023),同样对国内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扩大社会再生产中,经济循环的目的是要实现价值增殖和国民消费福祉的增进(裴长洪、刘

洪愧, 2021), 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定, 则本固邦宁。那么, 在促进经济循环过程中, 考虑双循环的供需特征, 供给和需求循环在实现稳就业中有何差异?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就业效应是多少? 在双循环背景下, 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哪些因素有利于实现“稳就业”的政策目标? 进一步, 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循环在中国就业增长中扮演何种角色? 祝坤福等(2022)证实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循环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尚未可知, 尤其是内外资企业间不同程度的循环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如何尚是待解之题。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的就业效应, 还能为中国未来通过调整引资政策实现“稳就业”目标, 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分析框架, 对中国经济循环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测度和分析, 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方法探究了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相比已有文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和价值主要在于以下三点。(1) 基于“经济循环”的供需视角, 对双循环的就业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丰富了双循环经济效应的研究。学术界对双循环的研究更多停留在指标测度方面, 对其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相对不足。张俊荣等(2022)和牛猛等(2023)分别基于大中小型企业规模异质性和功能分工视角测度了中国双循环的就业效应, 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但没有关注到双循环的供需特征, 而经济循环的供需视角是理解新发展格局和测度双循环经济效应的关键一环。(2) 从更加符合经济含义和保持宏观、微观测算一致性角度, 刻画了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 并将其纳入就业核算框架。进一步, 本文根据中间产品跨越企业边界的次数定义了内外资企业间和国内外企业间的简单循环和复杂循环, 度量了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循环互动程度及其就业影响。这一概念建立在对“经济循环”内涵特征理解的基础上, 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微观企业间循环与宏观经济循环统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3) 基于SDA方法, 深入剖析了供需双循环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为解释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比已有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SDA分解的文献(卫瑞、张文城, 2015; 田开兰等, 2018; 葛阳琴、谢建国, 2019; 谢锐等, 2023), 本文将重点放在双循环的微观企业层面, 度量了不同程度的异质性企业间循环(简单循环和复杂循环)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这对现有研究来说是有益补充和拓展。此外, 本文进行了跨期对比研究, 分析了供需循环各因素变动对中国就业平稳增长的影响。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第三部分为中国供需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分析; 第四部分为供需循环视角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二、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 (一) 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业核算模型构建

假设全球由  $G$  个国家<sup>①</sup>组成, 每个国家有  $N$  个行业, 每个行业有 2 种不同类型的企业, 即内资企业( $D$ )和外资企业( $F$ )。全球基本投入产出结构如表 1 所示, 其中  $Z$  是一个  $2GN \times 2GN$  的矩阵, 表示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企业间的中间投入矩阵。例如,  $s$  和  $r$  分别代表不同的两个国家;  $Z_{FD}^{sr}$  表示  $s$  国外资企业的中间品投入于  $r$  国内资企业的再生产中;  $Y_i^{sr}$  表示  $s$  国不同类型企业的最终品被  $r$  国直接消费( $i=D, F$ );  $Va_i^s$  和  $X_i^s$  分别表示不同类型企业的增加值和总产出。

<sup>①</sup> 在此做统一说明, 本文出现的国家(国)指国家(地区)。

表1 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总产出	
		1		2		...	G		1	2	...		G
中间投入	1	$Z_{DD}^{11}$	$Z_{DF}^{11}$	$Z_{DD}^{12}$	$Z_{DF}^{12}$	...	$Z_{DD}^{1G}$	$Z_{DF}^{1G}$	$Y_D^{11}$	$Y_D^{12}$	...	$Y_D^{1G}$	$X_D^1$
		$Z_{FD}^{11}$	$Z_{FF}^{11}$	$Z_{FD}^{12}$	$Z_{FF}^{12}$	...	$Z_{FD}^{1G}$	$Z_{FF}^{1G}$	$Y_F^{11}$	$Y_F^{12}$	...	$Y_F^{1G}$	$X_F^1$
	2	$Z_{DD}^{21}$	$Z_{DF}^{21}$	$Z_{DD}^{22}$	$Z_{DF}^{22}$	...	$Z_{DD}^{2G}$	$Z_{DF}^{2G}$	$Y_D^{21}$	$Y_D^{22}$	...	$Y_D^{2G}$	$X_D^2$
		$Z_{FD}^{21}$	$Z_{FF}^{21}$	$Z_{FD}^{22}$	$Z_{FF}^{22}$	...	$Z_{FD}^{2G}$	$Z_{FF}^{2G}$	$Y_F^{21}$	$Y_F^{22}$	...	$Y_F^{2G}$	$X_F^2$
	⋮	⋮	⋮	⋮	⋮	⋮	⋮	⋮	⋮	⋮	⋮	⋮	⋮
	G	$Z_{DD}^{G1}$	$Z_{DF}^{G1}$	$Z_{DD}^{G2}$	$Z_{DF}^{G2}$	...	$Z_{DD}^{GG}$	$Z_{DF}^{GG}$	$Y_D^{G1}$	$Y_D^{G2}$	...	$Y_D^{GG}$	$X_D^G$
		$Z_{FD}^{G1}$	$Z_{FF}^{G1}$	$Z_{FD}^{G2}$	$Z_{FF}^{G2}$	...	$Z_{FD}^{GG}$	$Z_{FF}^{GG}$	$Y_F^{G1}$	$Y_F^{G2}$	...	$Y_F^{GG}$	$X_F^G$
增加值		$Va_D^1$	$Va_F^1$	$Va_D^2$	$Va_F^2$	...	$Va_D^G$	$Va_F^G$					
总投入		$(X_D^1)'$	$(X_F^1)'$	$(X_D^2)'$	$(X_F^2)'$	...	$(X_D^G)'$	$(X_F^G)'$					

一般地,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看成劳动力参与的结果,参考葛阳琴和谢建国(2019)及Wang等(2021a),本文引入就业系数向量( $e^s = E^s/X^s$ ),即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向量,从而得到s国就业的列向量:

$$E^s = \hat{e}^s \cdot B \cdot Y \cdot \mu \quad (1)$$

其中, $\mu$ 表示元素全部为1的 $GN \times 1$ 向量,主要用于部门层面的加总; $B$ 通常称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反映全球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间的经济关联。投入产出分析能够揭示经济体系的循环结构(林晨、尤晶,2023),纳入企业维度的里昂惕夫逆矩阵暗含中间品在国内不同企业间和国内外企业间进行循环互动,这为本文测度双循环提供了思路。基于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本文将 $B$ 进一步分解,从而得到s国的就业:

$$E^s = \hat{e}^s \cdot L^{ss} \cdot Y \cdot \mu + \hat{e}^s \cdot (B - L^{ss}) \cdot Y \cdot \mu \quad (2)$$

其中, $L^{ss}$ 是本地里昂惕夫逆矩阵,代表国内企业间的循环,指的是中间品未跨境仅依赖国内生产链完成生产; $B - L^{ss}$ 代表国内外企业间循环,指的是中间品的跨境生产。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循环关系,本文将国内企业间循环分为内资企业间循环( $K_{DD}^{ss}$ )、外资企业间循环( $K_{FF}^{ss}$ )和内外资企业间循环( $L^{ss} - K_{DD}^{ss} - K_{FF}^{ss}$ ):

$$E^s = \hat{e}^s \cdot [K_{DD}^{ss} + K_{FF}^{ss} + (L^{ss} - K_{DD}^{ss} - K_{FF}^{ss})] \cdot Y \cdot \mu + \hat{e}^s \cdot (B - L^{ss}) \cdot Y \cdot \mu \quad (3)$$

$$K_{DD}^{ss} = \begin{bmatrix} (I - A_{DD}^{ss})^{-1} & 0 \\ 0 & 0 \end{bmatrix}; K_{FF}^{ss} = \begin{bmatrix} 0 & 0 \\ 0 & (I - A_{FF}^{ss})^{-1} \end{bmatrix}; L^{ss} = \begin{bmatrix} I - A_{DD}^{ss} & -A_{DF}^{ss} \\ -A_{FD}^{ss} & I - A_{FF}^{ss} \end{bmatrix}^{-1}$$

类似于根据中间品的跨境次数划分GVC(Wang等,2017,2021b),根据中间品跨越不同类型企业边界的次数,本文将一国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分为内外资企业间的简单循环和复杂循环,将国内外企业间循环划分为国内外企业间的简单循环和复杂循环。这样划分的目的是探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循环互动程度,从而度量其引致的就业:

$$E^s = \hat{e}^s \cdot [K^{ss} + K^{ss} \cdot A^{ssF} \cdot K^{ss} + (L^{ss} - K^{ss} - K^{ss} \cdot A^{ssF} \cdot K^{ss})] \cdot Y \cdot \mu + \hat{e}^s \cdot [L^{ss} \cdot A^F \cdot L^{-ss} + (B - L^{ss} - L^{ss} \cdot A^F \cdot L^{-ss})] \cdot Y \cdot \mu \quad (4)$$

式(4)中, $K^{ss} = K_{DD}^{ss} + K_{FF}^{ss}$ ,代表国内同一类型企业间的循环; $A^{ssF}$ 和 $A^F$ 分别表示s国内外资企业间



中间品使用对应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 $s$ 国国内外企业间中间品出口对应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为了表述简洁,令 $B_1 = K_{DD}^{ss}$ ,  $B_2 = K_{FF}^{ss}$ ,  $B_3 = K^{ss} \cdot A^{ssF} \cdot K^{ss}$ ,  $B_4 = L^{ss} - K^{ss} - K^{ss} \cdot A^{ssF} \cdot K^{ss}$ ,  $B_5 = L^{ss} \cdot A^F \cdot L^{-ss}$ ,  $B_6 = B - L^{ss} - L^{ss} \cdot A^F \cdot L^{-ss}$ ,式(4)可以改写为:

$$E^s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1 \cdot Y \cdot \mu}_{\text{内资企业间循环}}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2 \cdot Y \cdot \mu}_{\text{外资企业间循环}}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3 \cdot Y \cdot \mu}_{\text{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4 \cdot Y \cdot \mu}_{\text{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5 \cdot Y \cdot \mu}_{\text{国内外企业间简单循环}}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6 \cdot Y \cdot \mu}_{\text{国内外企业间复杂循环}} \quad (5)$$

式(5)从中间品供给循环角度,将一国的总就业分解为6项。其中,第1~4项度量了同一类型和不同类型企业间循环活动引致的就业,由于这部分涉及的是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且生产环节不涉及国外,因而被称为供给端纯国内循环的就业效应。后两项度量了国内外企业间循环活动引致的就业,由于这部分生产活动涉及国内和国外生产环节,因而被称为供给端国内国际循环的就业效应。<sup>①</sup>需要说明的是,式(5)是一个新的分解框架。它提供了对企业间循环互动价值的洞察以及企业内在参与行为的理解,特别是考虑了不同程度的企业间循环所引致的就业,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

在一个完整的循环中,供需均不可或缺。基于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本文将 $Y$ 分为内需( $Y^s$ )和外需( $Y^{-s}$ ),式(1)可表示为:

$$E^s = \hat{e}^s \cdot B \cdot Y \cdot \mu = \hat{e}^s \cdot B \cdot Y^s \cdot \mu + \hat{e}^s \cdot B \cdot Y^{-s} \cdot \mu \quad (6)$$

区分企业异质性,内需可以划分为国内消费者对本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外需可以划分为国外消费者对本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从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视角,同时考虑双循环的属地性质,式(6)可以写成:

$$E^s = \hat{e}^s \cdot B \cdot Y \cdot \mu = \underbrace{\hat{e}^s \cdot B \cdot Y_D^{ss} \cdot \mu}_{\text{国内对内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 + \underbrace{\hat{e}^s \cdot B \cdot Y_F^{ss} \cdot \mu}_{\text{国内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 + \underbrace{\hat{e}^s \cdot B \cdot Y_D^{(-s)} \cdot \mu}_{\text{国外对内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 + \underbrace{\hat{e}^s \cdot B \cdot Y_F^{(-s)} \cdot \mu}_{\text{国外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 + \underbrace{\hat{e}^s \cdot B \cdot Y^{(-s)s} \cdot \mu}_{\text{国内对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 + \underbrace{\hat{e}^s \cdot B \cdot Y^{(-s)(-s)} \cdot \mu}_{\text{国外对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 \quad (7)$$

需求端纯国内循环的就业效应      需求端国内国际循环的就业效应      需求端纯国际循环的就业效应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部分,需求属地是国内,最终品来源于国外,“经济循环”划分自然归属于国内国际循环范围;国外消费者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部分,需求属地和最终品来源地均在国外,属于纯国际循环的范围,与本国无直接关联,但生产国外企业最终品往往使用了本国中间品,从而会引致本国就业。

新发展格局下的双循环是供需双侧和内外双向的双循环。同时考虑供需端,结合式(5)和式(7),本文得到一国经济双循环的就业效应测度公式:

$$E^s = \hat{e}^s \cdot B \cdot Y \cdot \mu = \underbrace{\hat{e}^s \cdot L^{ss} \cdot Y^{ss} \cdot \mu}_{\text{国内循环的就业效应}} + \underbrace{\hat{e}^s \cdot L^{ss} \cdot (Y - Y^{ss}) \cdot \mu + \hat{e}^s \cdot (B - L^{ss}) \cdot Y \cdot \mu}_{\text{国内国际循环的就业效应}} \quad (8)$$

## (二)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SDA

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是投入产出分析中比较成熟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环境和就业

<sup>①</sup> 与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一样,本文对双循环的划分是基于价值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GDP分解的“属地原则”,由于与外资企业相关的生产循环活动发生在一国境内,因而归属于“纯国内循环”。

等领域(葛阳琴、谢建国,2019;倪红福、田野,2023)。和已有研究相似,本文运用SDA方法中的“两级分解平均法”(Dietzenbacher和Los,1998;Miller和Blair,2009),来度量包括企业间循环在内的因素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劳动力的就业变动。根据式(1),s国劳动力就业变动可以划分为就业强度效应( $\Delta\hat{e}^s$ )、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效应( $\Delta B$ )和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效应( $\Delta Y$ )。从*t*-1期到*t*期,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变动可以表示为:

$$\begin{aligned}\Delta E^s &= E_t^s - E_{t-1}^s = \hat{e}_t^s \cdot B_t \cdot Y_t \cdot \mu - \hat{e}_{t-1}^s \cdot B_{t-1} \cdot Y_{t-1} \cdot \mu \\ &= C(\Delta\hat{e}^s) + C(\Delta B) + C(\Delta Y)\end{aligned}\tag{9}$$

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 $\Delta\hat{e}^s$ 又可以分为内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 $\Delta\hat{e}_D^s$ )和外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 $\Delta\hat{e}_F^s$ ),即:

$$\Delta\hat{e}^s = \Delta\hat{e}_D^s + \Delta\hat{e}_F^s\tag{10}$$

根据式(5)和式(7),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效应( $\Delta B$ )和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效应( $\Delta Y$ )又可进一步分解:

$$\Delta B = \Delta B_1 + \Delta B_2 + \Delta B_3 + \Delta B_4 + \Delta B_5 + \Delta B_6\tag{11}$$

$$\Delta Y = \Delta Y_1 + \Delta Y_2 + \Delta Y_3 + \Delta Y_4 + \Delta Y_5 + \Delta Y_6\tag{12}$$

结合式(9)~式(12),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最终品需求循环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核算框架,探讨了供需双循环视角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共分解为以下14个因素的影响(具体含义见表2):

$$\begin{aligned}\Delta E^s &= C(\Delta\hat{e}_D^s) + C(\Delta\hat{e}_F^s) + C(\Delta B_1) + C(\Delta B_2) + C(\Delta B_3) + C(\Delta B_4) + C(\Delta B_5) + C(\Delta B_6) + \\ &\quad C(\Delta Y_1) + C(\Delta Y_2) + C(\Delta Y_3) + C(\Delta Y_4) + C(\Delta Y_5) + C(\Delta Y_6)\end{aligned}\tag{13}$$

表2 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

		影响因素	含义
就业强度效应		$C(\Delta\hat{e}_D^s)$	内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
		$C(\Delta\hat{e}_F^s)$	外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
中间品供给循环效应	纯国内循环	$C(\Delta B_1)$	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
		$C(\Delta B_2)$	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
		$C(\Delta B_3)$	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
		$C(\Delta B_4)$	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
	国内国际循环	$C(\Delta B_5)$	国内外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
		$C(\Delta B_6)$	国内外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
最终品需求循环效应	纯国内循环	$C(\Delta Y_1)$	国内对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C(\Delta Y_2)$	国内对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国内国际循环	$C(\Delta Y_3)$	国外对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C(\Delta Y_4)$	国外对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C(\Delta Y_5)$	国内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纯国际循环	$C(\Delta Y_6)$	国外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三)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最新发布两个数据库。一是跨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析数据库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MNE)。该数据库提供了 2005—2016 年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Cadestin 等, 2018), 涵盖全球 60 个国家 (地区)。其中, 每个国家包含 34 个部门, 每个部门被分解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从而使得从微观企业视角测度一国经济双循环的就业效应成为可能。二是与之相配套的就业贸易数据库 (the Trade in Employment Database, TiM)。该数据库提供了 51 个国家 45 个部门的就业数据和劳动力报酬数据 (Horvát 等, 2020)。由于两个数据库都是依据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 4 版进行分类, 且又源于同一机构, 因而具备良好的匹配性。<sup>①</sup>

以上数据库没有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就业量。为此, 本文参考田开兰等 (2018) 和张俊荣等 (2022) 关于异质性投入产出表就业向量的处理思路, 以及祝坤福等 (2022) 和 Hou 等 (2023) 的部分假设对现有数据进行处理。(1) 由于没有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数据, 本文参照 Hou 等 (2023) 的处理方式, 首先假设同一部门内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同, 用各部门劳动力报酬除以各部门就业量得到各部门单位劳动力工资水平。(2) 祝坤福等 (2022) 在处理内外资企业劳动力报酬时, 假设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报酬和资本收益在增加值中的占比和东道国内资企业一致, 是目前较好的一种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 本文假设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相同, 即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报酬与资本收益比相等。这是因为, AMNE 数据库提供了区分内外资企业的要素收益 (劳动力报酬+资本收益)。相比祝坤福等 (2022) 的假设, 这一假设不但契合投入产出同一行业的生产同质性假设 (产品生产是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且更好地利用了 AMNE 数据库的结构信息。根据这一假设, 本文利用各部门劳动力报酬作为控制数和 AMNE 数据库, 得到各部门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报酬。(3) 将各部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力报酬除以“单位劳动力工资”就得到各部门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就业量。

## 三、中国供需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分析

### (一)中国供给循环的就业效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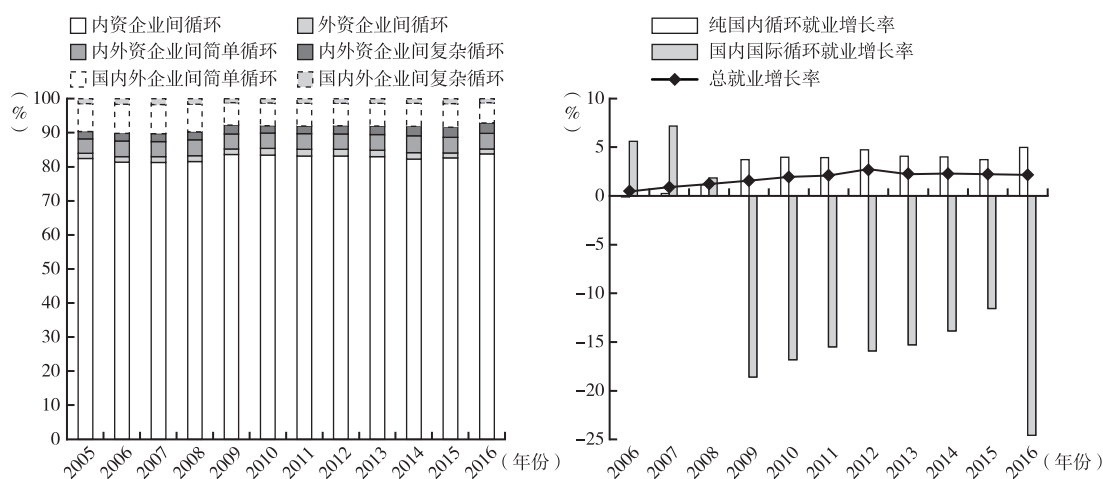
图 1 显示了基于企业间中间品供给循环的就业效应。结果显示, 国内企业间循环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 2005—2016 年纯国内循环引致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89.77%~92.89%, 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占比约为 7.11%~10.23%。大量研究证明, 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显著特征 (江小涓、孟丽君, 2021; 黄群慧、倪红福, 2021; 倪红福、田野, 2023), 而作为连接国民经济循环四环节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纽带的就业也呈现该特征。

整体来看, 纯国内循环成为拉动中国就业增长、实现稳就业目标的主要力量。2005—2016 年纯国内循环就业增长 4.99%, 国内国际循环就业下降了 24.57%, 总就业增幅为 2.14%。分阶段看, 金融危机前国内国际循环引致就业呈现高速增长。如 2005—2007 年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增长了 7.16%, 而同时期的纯国内循环就业仅增长了 0.24%。事实上, 中国依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 实现了“以外促内”“以内助外”的华丽转变, 通过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卫瑞、张文城, 2015)。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经济

<sup>①</sup> 2023 年 6 月, OECD 发布了 2000—2019 年区分内外资企业的数据库, 但该版本的数据库只是初步版本, 本身尚不完善, 且在进一步修订 (如部分年份行业增加值出现负值)。因此, 综合考虑, 本文选定旧版数据库进行测度研究。

严重衰退,受外部需求影响,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增速快速回落,2009年较2005年下降了18.60%,此后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尽管逐年恢复,但增速难以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且从2015年后,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再次显著下降,如2016年国内国际循环就业较2015年急速下降14.72%。面临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中国积极出台救市政策,用纯国内循环就业的增长补齐了国内国际循环就业下降的缺口,如2009年纯国内循环就业较2008年增长了2.54%,实现了危机时期“稳就业”的目标。因此,中国总就业在2008年并没有下滑,反而稳步上升。但纯国内循环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渐退后,纯国内循环就业增速下滑。如2009年较2008年纯国内循环就业增长率为2.54%,2010年同比增长率为0.21%。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复苏乏力叠加纯国内循环就业扩张动力不足,中国总就业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略有下滑,如2005—2012年总就业增长达到了2.76%,此后出现下滑。尽管就业下滑趋势被快速制止,但在2016年纯国内循环就业的扩张规模难以抵消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再次骤降的冲击,总就业较2015年下降约75.02万人,总就业增长曲线略有回落。

就业是企业间商品和服务供给循环的直接结果,企业间的循环畅通对于通过稳市场主体来实现稳就业目标意义重大。从更细项来看,纯国内循环中内资企业间循环活动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如2016年中国76245万人就业岗位中,内资企业间循环贡献了83.79%的就业岗位。作为连接内外循环的载体,外资企业在中国就业中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与内资企业循环上(见图1)。如2016年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活动提供了中国7.65%的工作岗位,而外资企业间循环就业占比仅为1.44%。此外,区别于略有波动的内资企业间循环就业占比,与外资企业有关的企业间循环就业占比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提升态势,从2005年的7.85%上升到2016年的9.1%。自2005年以来,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持续增长(刘建丽,2019),这种由国外资本有序流入形成的外资企业间循环以及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活动,成为拉动中国就业的重要力量。对比发现,研究期内相对于外资企业间循环和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就业的频繁波动,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就业占比在2005—2009年及2010—2016年两个时期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愈加紧密的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对实现稳就业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国际循环就业中,国内外企业间简单循环就业占主体。从趋势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简单循环和复杂循环就业占比保持下降趋势,且均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注:左图纵坐标代表不同类型企业间循环引致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右图纵坐标代表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业相比2005年就业的增长率,下同。



## (二)中国需求循环的就业效应分析

图2显示了基于对企业最终品需求循环的就业效应。与供给端双循环一样,纯国内循环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国内国际循环和纯国际循环。2005—2016年,纯国内循环引致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为80.08%~86.38%,国内国际循环和纯国际循环分别是6.88%~10.02%和6.74%~9.9%。

从构成上看,国内对内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是纯国内循环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而国外对内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是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两者引致就业量合计占到中国总就业的85%以上。外资企业作为连接内外循环的载体,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也在拉动中国就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样本期内,国内外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平均每年拉动了中国3871万人的就业岗位,占中国总就业的5.1%。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对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引致就业占比为6.74%~9.9%(即纯国际循环的就业效应),在所有因素中排名第2位。在生产分散化和投资全球化背景下,国外对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能够经由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间接依赖我国企业提供的中间品(侯俊军等,2023),从而拉动本国就业。例如,英国消费者购买美国生产的特斯拉Model 3,其中的动力电池组、电桩结构件、电解液电池组外壳等部分零部件是由中国企业生产并提供的。但是从趋势上看,纯国际循环引致就业在下降,从2005年的9.37%下降到2016年的6.74%。纯国际循环属于外需的一部分,这一变化与金融危机后外需疲软的现实背景趋势相一致。

分阶段看,尽管纯国内循环是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但是金融危机前纯国内循环引致就业在下降,如2005—2007年下降了1.11%。而同时期的国内国际循环就业和纯国际循环就业却保持高速增长,分别增长了13.32%和6.63%。此时,外循环促进了就业的平稳增长。以2008年为转折点,与内循环相关的因素引致就业占比都在上升,纯国内循环对稳就业的作用在逐渐增强,如2008—2016年增长了7.98%。而同时期的国内国际循环和纯国际循环引致就业总体在下降,尤其是2016年两者分别较2005年下降了21.24%和26.51%。此时,纯国内循环促进了就业的平稳增长,其中的国内对内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以2012年为转折点,中国就业总量开始下降,中国总就业增长曲线略有回落。但是,该时期纯国内循环就业增速总体在增加,而同时期国内国际循环和纯国际循环就业增速下降明显。纯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保持了就业的平稳增长,实现了“稳就业”的目标。与此同时,稳就业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基本保障(张俊荣等,2022),因为纯国内循环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扩大消费需求,而保住就业才能保障人民群众持久的收入来源,进一步扩大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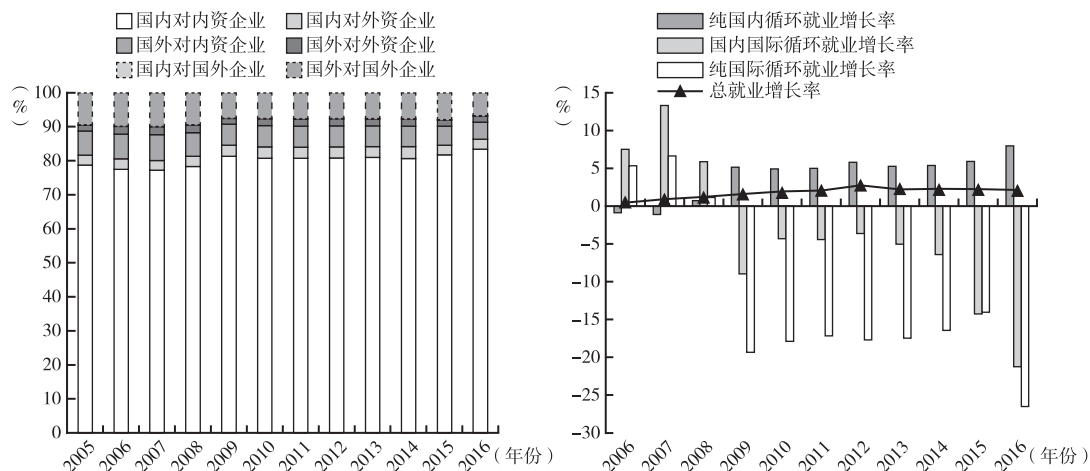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需求循环的就业效应及增长率

### (三)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分析

同时考虑供给循环和需求循环,得到整体意义上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如图3所示,我国就业呈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显著特征,平均每年拉动了63107万人的就业岗位,且国内循环引致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始终超过80%。而国内国际循环活动平均每年拉动了12773万人的就业岗位,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约为16.83%,国内国际循环在拉动就业增长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趋势上看,中国嵌入国内国际循环的就业规模在2007年达到峰值(15115万人)。2008年后,国内国际循环引致的就业量开始下降,但国内循环主导就业增长的态势日渐明晰,国内循环就业占比稳中有升,从2008年的81.16%上升到2016年的86.19%,成为实现稳就业的关键。正如习近平(2022)提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就业层面也呈现相同的趋势。牛猛等(2023)通过纳入功能分工视角测度中国双循环的就业效应也证实了相关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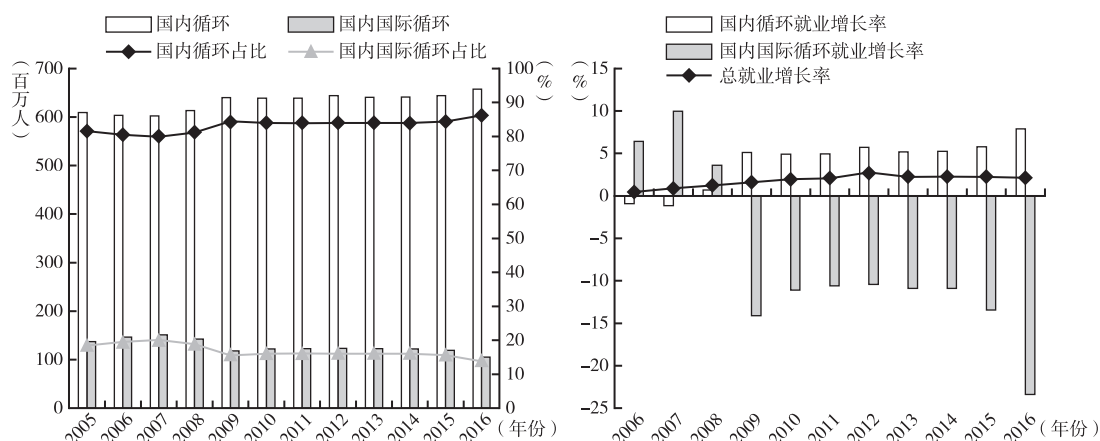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及增长率

从绝对量上看,样本期内我国就业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从2005年的74647万人到2016年的76245万人,增长了2.14%。其中,国内循环引致就业增加了4813万人,增长了7.9%,而国内国际循环减少了3215万人,下降了23.4%。可以说,实现中国稳就业的关键在于国内循环,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国内循环对就业增长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见图3)。国内循环对中国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意义重大,因为其不仅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体,还是应对外部需求调整对中国就业冲击的“压舱石”。例如,面对金融危机期间严重的外部危机冲击(2008—2009年)以及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和结构性调整引起的总就业下降(2012—2016年),国内循环引致就业的增长抵消了国内国际循环就业的急剧萎缩,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成为稳定并促进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

## 四、供需循环视角下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 (一)供需循环效应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尽管金融危机引致的外需下降对我国就业产生一定冲击,且2012年中国结构性减速导致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强(张鹏等,2019),但中国就业总体保持增长趋势。接下来,将进行结构分

解分析,度量各因素变动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如前所述,2008年金融危机是我国就业格局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后,国内循环主导就业增长的态势日渐明晰。从整体就业变动来讲,2012年中国就业总量由增转降。因此,综合考虑不同节点就业的差异性和劳动力就业变动特征,以2008年、2009年和2012年为时间节点,将SDA划分为5个时间段,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供需循环效应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单位:%
		2005—2008年	2008—2009年	2009—2012年	2012—2016年	2005—2016年
就业强度效应		-67.73	-7.25	-52.76	-34.93	-164.55
供给循环效应	纯国内循环	2.05	-0.66	1.35	9.23	12.24
	国内国际循环	3.72	-0.63	2.66	1.72	7.54
需求循环效应	纯国内循环	54.67	10.59	43.53	23.76	134.02
	国内国际循环	5.95	-0.89	4.63	-0.14	9.61
	纯国际循环	2.57	-0.80	1.75	-0.25	3.28
总变动		1.23	0.35	1.16	-0.60	2.14

注:表中数值代表各因素在某时期引致的就业变动量占期初就业量的比重,下同。

表3显示了基于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和对企业最终品需求的供需循环效应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强度效应抑制了中国的就业增长,而供给循环效应和需求循环效应整体上共同促进了中国就业的增长,保障了劳动力就业的稳定。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对偶变量,就业强度效应为负是中国劳动力配置的结果(蔡昉,2017)。2005—201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对劳动力需求形成了替代效应,导致就业下降了164.55%。分阶段来看,就业强度效应的负向影响总体上在减弱,这也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下降。而供给循环效应和需求循环效应两者抵消了就业强度效应对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保证了样本期内中国就业的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供需循环效应均促使了当期就业的增长,成为中国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关键。金融危机期间,需求循环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8.9%。金融危机后,需求循环效应进一步发力,如2009—2012年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49.9%。2012年后面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最终品需求效应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及2009—2012年增速(49.9%)的一半,仅促使当期就业增长23.37%,但仍是实现稳就业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供给循环效应在2012年后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2016年,供给循环提供了8401万人的就业增量,促使当期就业增长10.95%,远高于2009—2012年增速(4.01%)。此时,供给循环显现出强劲的稳就业作用。

在供给循环中,国内国际循环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危机期间(2008—2009年)国内国际循环效应促使当期就业减少了502万人;二是金融危机后,国内国际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减弱,远不及同时期的纯国内循环效应(2012—2016年),国内企业间循环保证了就业的稳定。在需求循环中,纯国内循环部分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始终为正,且在所有时期都是影响就业增长的最大因素,纯国内循环部分刻画的是我国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属于内需的一部分。这一结果说明,内需保证了我国就业稳定的基本盘。而国内国际循环和纯国际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2008—2009年和2012—2016年为负。尽管内需保证了我国就业稳定的基本盘,但是内需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

放缓,例如2012—2016年仅促使就业增长了23.76%,低于2009—2012年的43.53%,这意味着通过扩大内需促进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工作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上。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效应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同时考虑供给循环和需求循环效应,得到国内国际双循环效应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发现,国内循环效应是促进就业增长、实现稳就业的最重要因素。在整个研究期间及分阶段,国内循环效应不仅均促进了当期的就业增长,而且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与之对应的是,国内国际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例如,2008—2009年面对严重的外部冲击,国内国际循环效应促使当期就业减少了1757万人(-2.33%),而同时期的国内循环效应促使就业增加了7499万人(9.92%),实现了危机时期稳就业的目标。分阶段来看,金融危机后的两个时间段,双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减弱。但是,国内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远大于国内国际循环效应。例如,2012—2016年国内循环效应是国内国际循环效应的24.82倍,远高于2009—2012年的4.97倍。正如前文所述,国内循环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因此,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这不仅是对我国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也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形势的客观要求。

表 4	国内国际双循环效应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单位:%
	2005—2008年	2008—2009年	2009—2012年	2012—2016年	2005—2016年
就业强度效应	-67.73	-7.25	-52.76	-34.93	-164.55
国内循环效应	56.72	9.92	44.88	33.00	146.26
国内国际循环效应	12.24	-2.33	9.04	1.33	20.43
合计	1.23	0.35	1.16	-0.60	2.14

注:国内循环效应包括供给国内循环中的4个因素和需求国内循环中的2个因素;国内国际循环效应包含其余6个因素。

(三)各因素变动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表5显示了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SDA结果。2005—2016年,除内外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和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外,其余11个因素均促使了我国的就业增长。其中,国内对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是促使样本期内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两者均属于供需循环的国内循环部分,合计促使就业增长了139.70%。作为促进内外循环对接和吸纳就业的重要主体之一,外资企业也对中国就业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期间,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因素变动(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复杂循环效应和国内外对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8.85%。一方面,外资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内资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间互动交流产生的学习效应和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张婷等(2021)发现外资的增加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就业。另一方面,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刺激了就业增长。此外,国外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经由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为我国提供了就业机会,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3.28%。



表 5

各因素变动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影响

单位:%

	2005—2008 年	2008—2009 年	2009—2012 年	2012—2016 年	2005—2016 年
内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	-65.68	-6.99	-50.84	-34.26	-159.62
外资企业就业强度效应	-2.05	-0.25	-1.91	-0.66	-4.93
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	1.55	-0.83	1.26	7.79	10.00
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	-0.01	0.00	0.00	0.00	-0.00
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	0.30	0.02	0.15	0.60	1.09
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	0.21	0.13	-0.07	0.85	1.15
国内外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	3.08	-0.38	2.17	1.55	6.49
国内外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	0.64	-0.25	0.49	0.17	1.06
国内对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52.71	10.18	41.80	23.58	129.70
国内对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1.96	0.41	1.72	0.19	4.32
国外对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4.34	-0.39	3.27	-0.07	7.20
国外对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1.56	-0.50	1.29	-0.08	2.28
国内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0.05	-0.00	0.07	0.01	0.12
国外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2.57	-0.80	1.75	-0.25	3.28
合计	1.23	0.35	1.16	-0.60	2.14

跨期对比发现,受外部环境影响,国内国际循环效应相关因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稳定的,2008—2009年和2012—2016年相关因素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为负。而国内循环效应相关因素对稳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简单循环+复杂循环)和国内对内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效应是国内循环效应发挥稳就业作用的关键。在整个研究期间及分阶段内,以上因素均促使了当期就业的增长。其中,后者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前文所述,内需保证了我国就业稳定的基本盘,SDA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企业间相互联系的循环特征是理解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关键。我们发现,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相比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更为“稳定”。比如,2008—2009年前者促使就业增长了0.16%,而后者却使就业下降了0.83%。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期间,外资企业的生产联系更依赖于内外资企业生产网络结构的稳定,这种生产联系相对内资企业间的生产网络关系更有“黏性”。换句话说,外资企业上下游供应商的合适性一旦得到确认,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就不愿意改变合作伙伴,因为改变的成本高昂(Antràs等,2017),而本土内资企业由于有更多的选择,用新的供应商替代现有供应商的成本较低。这一点也可以从内外资企业间不同的合作程度来得到证明。2005—2016年,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促使就业增长了1.15%,高于简单循环效应的1.09%。且从趋势上看,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加大。尽管2009—2012年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具有负向影响,但2012—2016年面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张鹏等,2019)以及中国就业总量的下降,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0.85%)大于简单循环效应(0.60%)。更重要的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09年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前者促进中国就业增长了0.13%,后者仅为0.02%。这可能是因为面临金融危机受到冲击时,外资企业加强了与本土内资企业的生产合作,由此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引致就业高于复杂循环效应(见图1),但愈加紧密的



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对稳定中国就业的潜力更大,前文的构成分解也说明了这一点。与之不同的是,金融危机后,国内外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和复杂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正向影响在减弱,且简单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大于复杂循环效应。

## 五、结论和建议

立足微观视角兼顾经济的供需循环是理解新发展格局和测度双循环经济效应的关键一环。本文从企业间的中间品供给循环和对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循环视角出发,测度了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就业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SDA方法探究了供需循环视角下中国劳动力的就业变动,为理解“稳就业”政策目标提供了重要借鉴。

### (一)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就业呈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显著特征,无论是供给循环还是需求循环,国内循环都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从趋势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就业格局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后,国内循环主导就业增长的态势日渐明晰,成为中国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关键。

第二,在供给循环中,内资企业间循环是国内循环就业创造的主体。尽管内外资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高于复杂循环效应,但随着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互动程度的加深,复杂循环效应引致的就业水平持续提升,表现为其就业占比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在需求循环中,对内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拉动了中国超过85%的就业,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拉动就业在5%左右。国外对国外企业的最终品需求引致就业占比为6.74%~9.9%,在所有因素中排名第2位,但保持下降趋势。

第三,供给循环效应和需求循环效应两者抵消了就业强度效应对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共同促进了中国就业的增长,是中国实现稳就业的双重保障。以2012年为转折点,在此之前,需求循环效应显现出强劲的稳就业作用,其中的内需保证了我国就业稳定的基本盘。在此之后,需求循环效应尤其是其中的纯国内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放缓,这意味着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工作刻不容缓,而供给循环效应在2012年后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加大。

第四,国内循环效应保证了就业的平稳增长,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其中,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和国内对内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效应是国内循环发挥“稳就业”作用的关键,其中,后者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国内国际循环相关因素尽管也是促进中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稳定的。

第五,企业间相互联系的循环特征是理解中国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关键。相比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更为“稳定”。其中,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促使就业增长的幅度高于简单循环效应,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资企业间复杂循环效应对稳定中国就业的潜力更大。与之不同的是,金融危机后,国内外企业间简单循环效应和复杂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正向影响在减弱。

### (二)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国内大循环稳定就业的主体地位,畅通国内国际循环。当前,中国基本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兼有国内国际循环联动的双循环就业增长模式。要依托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契机,将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优势转化为就业增长的现实红利。在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我们要把战略基点放在自己身上,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各种不确定性。但也要注意,在发挥国内大循环稳就业主体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内国际循环在拉动就业增长中的作用,多

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比如拓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往来,降低与跨境贸易和投资相关的交易成本,加强 RCEP 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

第二,通过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来稳定和扩大就业,实现供需良性互动。上述结论证明,国内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效应是国内循环发挥稳就业作用的关键,内需保证了我国就业增长的“基本盘”。一方面,要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为契机,破解制约内需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堵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另一方面,要把扩大内需作为实现稳就业目标的基本立足点,增强内需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但也应看到,2012年后面对最终需求增长不足时,供给循环在稳定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供给侧的有效畅通可以打通循环堵点,满足现有需求并进一步引领创造新需求。因此,要统筹协调供需间的辩证关系,提升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的适配性,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提升国内供给质量,进一步释放内需增长潜力,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畅通内外资企业间循环,增强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互动“黏性”。企业间的循环畅通对于通过稳市场主体来实现稳就业目标意义重大。从就业数量上看,中国已经基本形成国内循环就业为主的格局,尽管内资企业间循环曾经在国际循环不畅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内外资企业间循环效应相比内资企业间循环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更为“稳定”,且内外资企业间循环特别是复杂循环成为引致就业增长新的动力源和稳定就业新的潜力源。这意味着实现稳就业不是单纯依靠内资企业间循环就业的主体地位,而是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要素和资源,畅通要素流动,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增强内外资企业间循环互动“黏性”。比如加强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对话,提高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供应商之间的商业配对机会;发挥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联通内外循环的优势,构筑内外资企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协作体系。

####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2. 陈全润、许健、夏炎、季康先:《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方法及我国双循环格局演变趋势分析》,《中国管理科学》2022年第1期。
3. 葛阳琴、谢建国:《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4期。
4. 侯俊军、岳有福、叶家柏:《供需双循环测度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统计研究》2023年第3期。
5. 黄群慧:《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
6. 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7. 黄群慧、陈创练:《新发展格局下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协同》,《改革》2021年第3期。
8.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9. 赖德胜:《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地促进就业》,《中国人口科学》2021年第1期。
10. 李帮喜、赵奕菡、冯志轩、赵峰:《价值循环、经济结构与新发展格局: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国际比较》,《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
11. 林晨、尤晶:《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边界与前景》,《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6期。
12. 刘建丽:《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
13. 刘志彪、凌永辉:《在主场全球化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前提、重点任务及政策保障》,《产业经济评论》2021年第6期。
14. 倪红福、田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动态变迁与国际比较——引入要素权属异质性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新框架》,《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5期。
15. 牛猛、王振国、张亚斌:《中国双循环就业效应及驱动因素研究——纳入功能分工的新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23年第3期。
16. 潘文卿、李跟强:《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17. 潘英丽:《新发展格局中的就业新趋势与结构性就业对策》,《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

18. 逢锦聚:《深化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0期。
19. 裴长洪、刘洪愧:《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6期。
20.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陈帅:《全球价值链、本地化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21. 田开兰、孔亦舒、高翔、杨翠红:《供给侧中国非农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5期。
22. 卫瑞、张文城:《中国外需隐含国内就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统计研究》2015年第6期。
23.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24. 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25. 谢锐、牛猛、张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中国管理科学》2023年第5期。
26. 徐奇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金融论坛》2020年第9期。
27. 张鹏、张平、袁富华:《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
28. 张俊荣、田开兰、张瑜、杨翠红:《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中国内外循环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探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2期。
29. 张婷、高德婷、蔡熙乾、谢申祥:《以“稳外资”助推“稳就业”》,《财贸经济》2021年第6期。
30. 祝坤福、余心玓、魏尚进、王直:《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活动测度及其增加值溯源》,《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31. Antràs, P., Fort, T. C., & Tintelnot, F., The Margins of Global Sourc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7, No. 9, 2017, pp.2514–2564.
32. Antràs, P., 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34, No.3, 2020, pp.551–574.
33. Cadestin, C., Backer, K. D., Desnoyers-James, I., Miroudot, S., Rigo, D., & Ye, M.,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OECD Analytical AMNE Database.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211, 2018.
34. Dietzenbacher, E., & Los, B.,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Sense and Sensitivity.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Vol. 10, No.4, 1998, pp.307–323.
35. Horvát, P., Webb, C., & Yamano, N., Measuring Employment in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 No.1, 2020.
36. Hou, J., Yue, Y., Wang, Q., Ye, J., & Zhang, M., Spillover-feedback Effects of Employment, Energ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4E) between Domestic-owned an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aking China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382, 2023, p.135276.
37. Miller, R. E., & Blair, P. D.,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Wang, Z., Wei, S. J., Yu, X., & Zhu, K.,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222, 2017.
39. Wang, L., Zhang, B., & Ye, J., Multiplier, Spillover and Feedback Effects of Employmen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kills and Sector-based Perspective.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21a, pp.1–34.
40. Wang, Z., Wei, S. J., Yu, X., & Zhu, K., Tracing Value Added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335, 2021b.

## Analysis of the Double Guarantee Effect of Supply and Demand Circulations on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HOU Junjun, YUE Youfu (Hunan University, 410079)

YE Jiabai (Tsinghua University, 100084)

SUN Kejua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50046)

**Summary:** Examin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circulations of the economy at a micro level is crucial for comprehending the 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and measuring their effects on employment, but it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in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two circulations in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mediate goods supply circul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the demand circulation for final goods of enterprises. It also dissects the factors driving changes in employment through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 by conside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s, and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has basically formed two engines driving the employment growth, with "domestic economic flows" as the primary driver, supplemented by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Domestic economic flows serving as the core stabilizer of employment remains consistent in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circulations. The supply circulation effect and the demand circulation effect both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ployment intensity on employment growth, thereby ensuring stable employment growth. However, starting from 2012, the influence of the demand circulation on employment growth has been slowing down, while that of the supply circul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The SDA results show that the key to "stable employment" lies in the strengthened posi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flows. The circulation between Domestic-Owned Enterprises (DOEs) an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domestic demand for final goods from both DOEs and FIE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omestic economy's key role i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Compared to the circulation effect between DOEs, the circulation effect between DOEs and FIEs has a more "stable" impact on employment growth. Over time, this complex circulation between DOEs and FIEs has gradually emerged a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 and a potential source for stable employment.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 circulations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alize the policy objective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flows i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capitalize on the oversized domestic market for driving employment growth. Additio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e role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flow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driving employment growth. Secondl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oost employment by tapping into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better aligning the supply system to the domestic demand. Finally, we should work harder to promote the flow of factors to stabilize and expand the stock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 the "stickin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OEs and FIEs.

**Keywords:** Supply Circulation, Demand Circulation, Complex Circulation between Domestic-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JEL:** C67, D57, J21

责任编辑: 常 思